

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小说中的武举情节模式分析

张博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

在明清两代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中，一些情节往往会体现出某种模式化特征。这其中，以英雄人物参与武举科考的情节模式尤为引人注目。本文通过对《东汉演义传》、《两汉中兴开国演义》、《说唐全传》、《说岳全传》中武举科考情节进行考察分析，以及与历史上真实的武举情况加以比对，认为小说中的武举与现实中的武举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别。小说中的武举情节重视的是英雄之间的直接比武，而并非真实武举考试中的比较武技。本文认为，古代小说中的武举情节实际上是比武夺魁情节的模式化处理，《三国演义》的“铜雀台比武”和《水浒传》的“大名府校场比武”因其情节的模式化或许可以被视为此类情节的源头。将比武夺魁的情节置于武举科考的特定背景之中，对于小说人物的塑造、小说情节结构的梳理、满足读者欣赏要求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作用。

关键词：武举、情节模式、民间趣味

Analysis of Historical Romance and Hero Legend Novels in Military Expedition Plot Mode

ZHANG B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novels and heroic legends of the two dynastie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ome plots often show some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This one, the plot pattern of heroes in the military expedition is particularly striking. This article through to the “Han kingdoms biography”, “Han founding Kingdoms”, “Tang biography”, “The life of Yue Fei” in the military expedition plot were studied, and compared with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real situation, that the military and reality in the novels of military expedition in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In the novel the military plot of attention is the direct ratio between the heroes, comparison of martial arts and not real military examination in th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ancient novels in the plot is actually won the contest examination mode of treatment of the plot, “Three Kingdoms” Dongjak contest “and the” Water Margin “of the” Damingfu school tournament “because of its plot mode may be seen as a source of such circumstances. The contest won the first prize in the specific background of plot military expedition, for shaping the characters, plot structure,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readers appreciate a comb, which has unique effect.

Keywords: military expedition, plot mode, folk interesting

在流行于明清两代的众多白话小说之中，一些以历史演进为创作背景，以英雄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演义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往往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点，即情节的模式化倾向。这体现为某一部小说中的某些情节，在其他小说之中往往以相同的方式，或是稍加变化的方式重复出现，最终成为一种模式。而由这些模式化情节组成的小说虽然在情节的编排方式上各有差别，呈现出多样性，但在整体上，这些小说却始终无法摆脱成为一部模式化作品的命运。这些小说情节的模式化特征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原因，正如论者所指出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却深深地受着既成的、因袭的文学成规的影响。文学成规与现实生活往往得不到同步的发展，其结果是作家常常被旧有的文学成规所囿，不能及时、真切、准确地反映流动着的生活和个体的体验与感受，最终只能落入一成不变的老套与窠臼。”¹而把握小说情节中存在的这种模式化特征，对其追根溯源，发掘出其中的特点往往能够成为我们解读小说的一把钥匙。

在这类模式化情节构成的小说中，众多英雄参与武举，大闹武科场的情节就曾经反复出现过。如《两汉开国中兴传志》²的卷之五中“子陵占卜文叔应试”，以及《东汉演义传》³第八回《严光卜卦知真主，王莽科场选俊英》之中，都叙述了王莽大开武举，东汉光武帝刘秀应考，岑彭夺取武状元的故事。再如《说唐全传》第四十回《罗春保眷归金墉，杨林设计谋反王》和第四十一回《勇罗成力抢状元魁，雄阔海压死千斤闸》中记载了隋炀帝在扬州摆下武科场，邀请天下反王夺武状元的情节。在《说岳全传》的第十二回《夺状元枪挑小梁王，反武场放走岳鹏举》中叙述了岳飞参加武举，枪挑小梁王柴桂的故事。

这三个情节所根源的历史时代完全不同，其中所包含的诸多细节也各具特点，笔者将其视为同一种模式化情节的依据，则是这三者的共同背景：武举考场。众所周知，科举制度诞生于隋朝。而武举制度则诞生于武则天时期。《资治通鉴·卷二零七》：“则天后长安二年春正月乙酉，初设武举。”⁴那么，无论是汉代的刘秀，还是隋唐年间的秦琼、罗成，都不可能参与尚未创立的武举之中。小说的作者为何一定要设置武举的故事情节，甚至不惜冒着违背历史常识的风险呢？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从小说中的“武举”和唐代创立的武举制度的异同说起。

¹ 胡跃生〈从一个情节模式看叙事艺术的情节构成〉[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7(10):127.

² 《两汉开国中兴传志》，明人黄化字著章回小说。全书共六卷四十二回，有万历三十三年(1605)刊本。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第2辑收录。

³ 《东汉演义传》，又名《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明人谢诏著章回小说。全书共十卷，有明代金陵大业堂刊本。经清人珊瑚城清远道人修订为《东汉演义评》，中华书局《古本小说丛刊》第14辑收录。

⁴ 《资治通鉴·卷二零七》[M].北京：中华书局，2013：7085.

一、基于真实武举制度的大胆想象

武则天首创武举考试，其考试的制度与科目在《新唐书·选举志》中有明确记载：“武举，盖其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始置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骑、平射、筒射，又有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⁵考校其中科目，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专门考察考生的力量，其中翘关“长丈七尺，径之寸半，凡十举后，手转关距，出处无过一尺”，负重“负米五斛，行二十步”皆属于此类。第二类科目考察考生在马上步下的射箭能力，其中包括长垛，“画帛为五规，置之于垛。又穿土为埽，其长与垛”，马射“均缀皮为两鹿，历置其上，驰马射之”⁶等，以及“步骑、平射、筒射”等，均属于此类。第三类考察考生的仪态外表，是否符合军官的标准，主要包括“身材、言语”两项。第四类科目直接考察考生在战场上的战斗能力，即《选举志》中所提到的“马枪”。但这“马枪”科目的考试也并非是由考生之间相互搏斗，而是“又断木为人，戴方版于顶上，凡四偶人至列埽上，驰入埽，运枪左右触，必版落而人不踣，名曰马枪。”⁷也就是由武举考生驰马使枪对固定的假人靶子进行刺杀演练。由此可见，唐代创立武举时，所考察的科目虽然复杂，但均属于非对抗性科目，并没有更为激烈的直接对抗性的考核。

宋代的武举考试增设了对考生智谋和将略的考察，将军事策论文的写作纳入考试科目之中，“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以至于“武举人以文墨进，杂于卒伍”⁸。至于白话小说昌盛的明代，武举考试的选举模式仍然与宋代差异并不大，据《明史·选举志》记载，明英宗天顺八年，“令天下文武官举通晓兵法、谋勇出众者，各省抚、按、三司，直隶巡按御史考试。中式者，兵部同总兵官于帅府试策略，教场试弓马。答策二道，骑中四矢，步中二矢以上者为中式。骑、步所中半焉者次之。”⁹武举考试的科目完全变成了策论和骑射。唐代武举考试中稍稍能体现一定对抗性的马枪科目也消失了。清代的武举虽然在明代的基础上有所修改，但仍然没有改变武举考试考察策论和骑射的主要形式。

综上，自武举考试在唐代创立以来，直到其最终消亡的清代，其考试内容就始终贯彻着非对抗性原则，从始至终避免考生与考生之间的直接比武。

回到反映武举考试的白话小说之中，我们就会发现，小说中的情节也展现了史实中武举考试的科目。比如在《东汉演义传》的第八回，冯异王霸等五人参加王莽的武举，也只是“先试弓弩，后搦枪刀”，五人演练结束，当即“各中纳用，即令上葵花亭赴宴。”岑彭在比赛射箭时，“拽硬弓，连断两把。”换第三张硬弓，方才“奋身兜起，连发三矢，俱中红心。”王莽大喜，“即封彭为武举

⁵ 《新唐书·卷四十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633.

⁶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88：884.

⁷ 《通典·卷十五·选举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88：884.

⁸ 《宋史·卷一百五十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85：2230.

⁹ 《明史·卷七十》[M]. 北京：中华书局，2015：1847.

状元。”再如，在《说岳全传》的第十一至第十二回，岳飞与小梁王柴桂争夺武状元，两人先比文采，“命岳飞做《枪论》，梁王做《刀论》”。比罢文字，两人又比弓箭，岳飞“不慌不忙，立定了身，当天下英雄之面，开弓搭箭，真个是弓开如满月，箭发似流星，飏飏的一连射了九枝”，均命中箭垛。

但在这些符合考试科目的比试之后，往往就出了岔子，一场大乱就此开始。在《东汉演义传》中，王莽封岑彭为武举状元，惹恼了景丹、盖延、坚谭（正史中为坚鐔）、马武，四人先后登场与岑彭争夺武状元。岑彭标打景丹，鞭打盖延，箭射坚谭，和马武的大战又是难解难分，“马武佯败诈走，岑彭赶上，马武提起红锦套索，将岑彭一挽，彭见，接住其索，奋力拖扯，力并，无一折动。两下厮拒多时，不分胜负。忽葵花亭上一人言曰：‘吾与此二人解战。’遂张弓搭箭，望其套索一箭，射为两段，闪二人落于马下。”据《两汉开国中兴传志》补叙，射箭解斗之人，乃是吴汉。

在《说岳全传》之中，小梁王柴桂执意要与岳飞比武定输赢，两人写下生死文书，岳飞遂“耍的一枪，望梁王心窝里刺来。梁王见来得利害，把身子一偏，正中肋甲缘。岳大爷把枪一起，把个梁王头望下、脚朝天挑于马下；复一枪，结果了性命。”

唯有《说唐全传》第四十一回描述的众反王夺武状元，没有体现出史实中武举考试的科目，而是宣称“有人能夺此盔甲、袍带者，称为国首。汝等有本事的前来取者！”随后便是众家反王麾下的英雄纷纷出场比赛，王伯当、伍云召、秦琼先后上场，最终罗成“连挑四十二员大将下马”，夺了武状元。

由此可见，白话小说中的武举科考情节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历史上真实的武举考试的形式，保留了一些考试科目。小说中的英雄们也需要在考官面前作上一篇策论，或是在箭靶前施展百步穿杨的箭术。但这些科目扮演的只是陪衬的角色，武举情节的真正高潮则是后面的比武。没有这些演武、比箭、作论的环节，不足以营造出武举考场的真实气氛，而没有随后的比武环节，则不足以将情节的发展推向高潮。小说中的武举科考，其核心恰恰在于真实武举之中所规避的直接比武。而小说中的武举科考的构思的根源，并非基于历史上真实的缺乏对抗性的武举制度，而是在武举考试的基础上加以大胆的虚构幻设，进而构造出英雄人物直接交锋的情节，使得小说的节奏骤然紧凑，点燃了读者的阅读兴奋点。

二、比武夺魁模式溯源

综上，古代白话小说的“武举科考”情节，大抵可以将其总结为四个字：“比武夺魁”。武士为了争夺利益或者荣誉，无论是光明正大的决斗，还是自相残杀的厮斗，历来史不绝书。但这些史料并不足以作为白话小说中英雄人物“比武夺魁”的情节溯源。因为考察白话小说中的人物，既不适宜用儒家温良礼让的君子之道，也不宜采用后世武侠作品的侠义之道，而应该将其还原到小说作者所秉承的市井思维，以民间视角加以考察。

正如民间俗语有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和评价文学作品时的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相比，对于武艺的评判似乎更为方便。因为从民间视角看来，大可以让英雄们直接较量一番，以定出英雄的座次。《说唐全传》中十八条好汉的排行榜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民间流行的三国英雄排名“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也来源于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

因此，在古代小说中，英雄豪杰比较武艺高下的几乎唯一方式就是直接较量。即使英雄人物并没有较量之意，经过小说家的妙笔幻设，也让小说中充满了这种直接对抗的火药味。《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记载关羽向孔明询问马超的才能：

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¹⁰

但这段文字经过罗贯中写到《三国演义》之中就成了关羽对马超的武艺不以为然，想要直接较量一番。《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

（关）平拜罢，呈上书信曰：“父亲知马超武艺过人，要入川来与之比试高低。教就禀伯父此事。”玄德大惊曰：“若云长入蜀，与孟起比试，势不两立。”……云长问曰：“我欲与马孟起比试，汝曾说否？”……书曰：“亮闻将军欲与孟起分别高下。以亮度之：孟起虽雄烈过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¹¹

在短短的一段文字中四次出现“比试高低”、“分别高下”之类的表述，说明了罗贯中将《三国志》中关羽评判标准“人才”的高下，直接简化成了“武艺”的高低。作为历史演义小说中的开创者和佼佼者，《三国演义》尚且不能避免这种对于英雄人物的简单化的评价方式，更何况那些以《三国演义》为典范，艺术成就远低于《三国演义》的历史演义小说呢。

“比武夺魁”的情节模式不同于武将在疆场上的刀枪相搏，而是具有一定的模式化特征。首先，参与比武的英雄虽然可能是来自不同阵营的对手，但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敌对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平等的竞争者，如果他们的关系不平等，自然也就无法站在同一的起跑线上进行竞争。《说岳全传》之中，普通举子岳飞和南宁王柴桂在地位上不可等量齐观，双方在比武之前一定要立下相对平等的“生死文书”，才能走上比武的擂台。其次，英雄们比武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唯有胜者才能获得利益或者荣誉。在利益和荣誉的驱使下，本来素不相识的英雄捉对厮杀，乃至生死相斗。表现在“武举科考”类的情节中，这个

¹⁰ 《三国志·蜀书·关羽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2：856.

¹¹ 《三国演义》第六十五回《马超大战葭萌关，刘备自领益州牧》[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466.

终极诱惑就是“武状元”，即使是岳飞，也表现出对武状元极高的热情，“小人怎敢妄想作状元。但今科场中，有几千举子都来考试，那一个不想做状元？其实状元只有一个，那千余人那能个个状元到手？”¹²第三，英雄之间的火药味和比武激烈程度是逐渐升级的，在比武开始阶段，出场的一定是武艺较低的人物，这些英雄在比武中严守比赛规则，即使是直接较量也能做到点到为止，不伤性命，不伤和气。随着武艺更为高强的豪杰下场，英雄之间的争斗也逐渐丧失理智，越发惨烈起来，失败的英雄即使想要全身而退也成了一种奢望。在《东汉演义传》中，首先登场和岑彭争夺武状元的是武艺一般的景丹、盖延、坚谭三人。三人被打伤败下阵来，武艺更高的马武方才登场。《说唐全传》中，首先登场的是山后定阳王刘武周的先锋甄翟儿，和他交战的是王世充的元帅段达。随后盖世雄、王伯当、伍云召、左雄、秦琼等主要英雄方才先后出场。盖世雄、王伯当虽然战败，尚可逃得性命，而伍云召作为《说唐全传》中武艺排名第五的好汉，也难免死在左雄的没尾驹之下。直到全书第七条好汉罗成出场，连挑四十二员大将，夺得武状元。

上述三点是“比武夺魁”情节模式的特征。而考诸先代小说，庶几可以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找到此类情节的源头。

《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孔明三气周公瑾》中有曹营众将在铜雀台比箭夺袍的情节：“（曹）操欲观武官比试弓箭，乃使近侍将西川红锦战袍一领，挂于垂杨枝上，下设一箭垛，以百步为界。……操传令曰：‘有能射中箭垛红心者，即以锦袍赐之’”曹休、文聘、曹洪、张郃先后驰马射中红心，夏侯渊技高一筹“骤马至界口，扭回身一箭射去，正在四箭当中”，不料徐晃箭法更加高明“拈弓搭箭，遥望柳条射去，恰好射断柳条，锦袍坠地。徐晃飞取锦袍，披于身上”，从旁许褚“竟飞马来夺袍。两马相近，徐晃便把弓打许褚。褚一手按住弓，把徐晃拖离鞍鞞。晃急弃了弓，翻身下马，褚亦下马，两个揪住厮打。操急使人解开。那领锦袍已是扯得粉碎。”¹³

《水浒传》第十二回《青面兽北京斗武，急先锋东郭争功》：大名府梁中书有意提拔杨志，便在校场上点杨志与副牌军周谨比武，“你敢与周谨比试武艺高低？如若赢得，便迁你充其职役。”杨志“恐有伤损……于军不利”，提议“将两根枪去了枪头，各用毡片包里，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马，都与皂衫穿着，但用枪杆厮搠；如白点多都当输。”两人大战一场“看周谨时，恰似打翻了豆腐的，斑斑点点，约有三五十处；看杨志时，只有左肩胛下一点白。”两人随后比箭，杨志没有手下留情，“一箭正中周谨左肩，周谨措手不及，翻身落

¹² 金丰《说岳全传》第十一回《周三畏遵训赠宝剑，宗留守立誓取真才》[M]. 北京：中华书局，2009：115.

¹³ 《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曹操大宴铜雀台，孔明三气周公瑾》[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471.

马。”梁中书大喜，“教杨志截替了周谨职役。”不料此举惹恼了正牌军“急先锋”索超，执意要与杨志一决高下。两条好汉大战五十回合，不分胜负，梁中书“看得呆了”，急令旗牌官分开二将，对两人厚加赏赐，“都升做管军提辖使。”¹⁴

上述两个情节恰恰符合笔者所总结的“比武夺魁”情节模式的三个特点。第一、无论是铜雀台下曹军群雄还是大名府梁中书麾下众将，都既不存在明确的敌对关系，其相互地位也大致平等，英雄们只是比武竞技，而不是性命相搏。第二，在利益或者荣誉驱动方面，曹营众将所争的不仅仅是一件锦袍，更是在曹丞相面前一展身手的机会。同样，杨志所争夺的也不仅仅是一个正牌军的职位，更是顶头上司梁中书的青睐。第三，这两场争斗都有一个从冷静比试到龙争虎斗的升级过程。曹营众将一开始只是较量骑射，最后却变成了许褚和徐晃的直接厮打。杨志和周谨的较量只是陪衬，和索超真刀真枪的较量才是情节的高潮所在。

三、武举情节模式的特征

英雄“比武夺魁”情节虽古已有之，后世小说作者将其刻意放在武举考场的环境之中加以叙述，使之呈现以下三点独特之处：

首先，在情节上，武举情节为全书众多主要人物搭建了集体亮相，或者集体谢幕的舞台。科举考试作为封建王朝延揽人才的盛事大典，对于人才的吸引力有目共睹。众多士子为博取功名，也不惜皓首穷经。如蒲松龄般终生蹭蹬科场者，不知凡几。在历史上，武举的地位远不如文举，但在小说的作者来看，对于天下“扯的动十个力气的弓，端得起三百斤的制子”¹⁵的英雄汉汉的吸引力，也应不亚于文举。所以，在小说作者的艺术构思下，武举考场成了天下英雄豪杰趋之若鹜之地。《说唐全传》中西魏英雄即使是明知隋炀帝摆下考场是个阴谋，也仍然想要夺取魁首。《东汉演义传》中刘秀明知摆考场取士的王莽是篡汉的奸贼，也不免参与到考场之中。《说岳全传》中柴桂贵为藩王，仍然对武状元的位置情有独钟。

武举考场对于英雄的巨大吸引力为本来四散的英雄提供了一个集中出场的舞台。像《水浒传》式的一位英雄淡出叙述视野之后，另一位英雄出于某种原因顶替而轮流出场的模式被打破。绝大部分英雄可以出于同一个“夺取武状元”的目的走马灯式的上场，完成在整部小说中的亮相或者谢幕。《东汉演义传》和《两

¹⁴ 《水浒传》第十二回《青面兽北京斗武，急先锋东郭争功》[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44.

¹⁵ 《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向观察升官哭友，鲍廷玺丧父娶妻》[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07.

汉开国中兴传志》中，在王莽开科取士的考场上，除了主人公光武帝刘秀之外，同属于东汉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中的冯异、王霸、景丹、盖延、坚谭、岑彭、马武、吴汉等人相继出场亮相，在考场上通过演武和比武的方式展现了他们不俗的武功，这也为后文中这些英雄们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做好了必要铺垫。《说岳全传》中武举考场上虽只有岳飞和柴桂的直接争夺，但在前文第十回的“小校场私抢状元”故事中，两位在小说后文中大出风头的英雄杨再兴和罗延庆已经败在了岳飞枪下。这个英雄人物集体亮相的目的在武举考试情节之前，以另一种比武夺魁的方式提前实现了。

只有《说唐全传》的武举科场情节是英雄的集体落幕表演。在武举考场内外，“隋唐十八条好汉”之中的李元霸、宇文成都、雄阔海、伍云召、伍天锡、杨林等英雄先后或战死或意外身亡。前半部小说赖以支撑的十八条好汉的人物体系几乎全部解体。这种剧烈的人物格局的变化也是通过一场武举考试和武举考试背后的阴谋的方式集中实现的。

其次，在结构上，武举情节构成了情节发展。

这点以《说唐全传》最为突出，《说唐》这部小说在情节的设计上存在着明确两个中心，前半部《说唐》以秦琼和程咬金为主要任务，情节集中在瓦岗山结义兄弟啸聚山林，反抗隋炀帝暴政上。后半部《说唐》的主人公则变成了尉迟恭，情节也切换为尉迟恭扶保秦王李世民扫平群雄、开创大唐盛世。后半部小说中，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罗成等前半部小说中作者着力刻画的人物或者战败身死，或者彻底沦为次要人物。而前半部《说唐》和后半部《说唐》的分水岭正是第四十回和第四十一回的扬州武举。在扬州武举会之前，瓦岗寨和西魏国的国势蒸蒸日上，而隋王朝则日渐没落。隋王朝最终设下以邀请天下反王夺取武状元为借口，将其一网打尽的阴谋，标志着隋王朝与以西魏国为代表的反王的较量达到了最终的高潮。随着将反王一网打尽的阴谋的破产，隋朝最后的两个支柱杨林和宇文成都相继战死，隋炀帝也被宇文文化及谋杀，隋朝灭亡。伴随着共同敌人隋朝的灭亡，反王之间的矛盾和争夺成为小说情节中的主要矛盾，最终实现统一的唐公李渊和秦王李世民扫平群雄的故事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情节的主体。隋亡唐兴情节转换的节点就是扬州众反王的武状元争夺。正如前文所述，在武举考场内外的一系列战斗之中，无论是大隋阵营还是反隋阵营中的英雄人物大量集体阵亡，由英雄人物的体系构成的情节彻底解体，英雄末路的惨烈与悲凉也为随后隋王朝的轰然倒塌渲染了几许悲剧的气氛。另一方面，随着英雄人物集中谢幕，许多枝蔓情节也随着人物的死亡而得以肃清，比如，伍云召之死意味着伍云召为父报仇情节的结束，杨林之死意味着杨林与秦琼之间杀父之仇情节的结束等等。许多枝蔓情节的集中处理也为后文尉迟恭和李世民为主的后半部《说唐》清理出充裕的叙事空间。

第三，从读者接受层面来看，武科场英雄比武的情节满足了来自民间的读者的审美心理的预期。

刘秀、罗成所处的时代，武举制度尚未创立。岳飞也并非出于武举，《宋

史》岳飞本传记载：“宣和四年，真定宣抚刘韜募敢战士，飞应募”。¹⁶可见上述小说中的武举情节无不出自于作者的虚构。此举的目的，《说岳全传》的作者金丰一语道破：“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出于实。倘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忠实，而无以动一时之听。”若能做到“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则“娓娓乎有令人听之而忘倦矣。”¹⁷历史小说的创作不一定要拘泥于史实，而恰到好处的虚构，能够起到令读者“听之而忘倦”的良好艺术效果，而此类武举情节正是小说创作者钟爱的情节模式。

陈思和先生在论及古代小说中所蕴含的民间精神时曾指出：“真正的民间精神只有一个标志，就是追求自由自在的境界。……在古代，历史小说基本上是民间叙事，其对正统的庙堂叙事的解构体现了民间叙事的活力，文学中的想象力和自由自在的精神体现得最为充分。”¹⁸小说不必拘泥于历史的真实，但需要尊重读者的需求。在蕴含着民间自由精神的创作中，创作者必须将自身置身于读者之中，才能创作出读者所认可的通俗小说作品。绝对自由自在的境界在通俗的艺术领域中并不存在。尤其是明清时代，当通俗小说的创作已经和出版业紧密结合，这种艺术对于市场的妥协就顺理成章了。正如陈大康先生所论述的：“将一部作品付诸刊印，意味着他被投入了商品生产、流通渠道，于是它就得接受这方面的法则与规律的支配，至于他的艺术水准、思想倾向等文学方面的因素，只有在转化为可估量的经济价值后才会被考虑。”¹⁹

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或是英雄传奇小说如何才能赢得更多读者的欢迎呢？小说的创作者大抵会采取以下两种方法。首先、从百姓的生活中寻求民众最普遍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即试图去把握存在于民众潜意识之中的历史记忆，即所谓“民俗”。违背民俗或者民众普遍心理的创作一定是失败的。但历史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并非严格地反映民众的生活，而是在民众生活和民俗的基础上，用受到民俗影响的历史观和英雄观去重塑历史，重塑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这样的塑造方式也就使得历史人物身上洋溢着张扬的民间色彩。民众对于英雄的评价缺乏多维度的认识，诸葛亮式的帝王师形象只是下层知识分子的理想化身，而并非市民、甚至是流民所仰慕的对象。他们所崇拜的岳武穆精忠报国的精神固然可嘉，但其枪法也出神入化，秦叔宝固然义薄云天，但其铜法也世所罕见。英雄需要一个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理想人格，但理想人格必须寄托在一个具备尚武精神且孔武有力的身体上。对于强者的崇拜，对于武艺和力量的追求，反映出的正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市民和流民的心声。这种心态体现在小说的情节上，就表现为对比武情节的钟爱，而“比武夺魁”的情节模式也得以应运而生。而将“比武夺魁”模式置于武举考场上进行，则体现了底层民众对于以功名改变命运的异常渴求，其中不

¹⁶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85：9702.

¹⁷ 金丰《说岳全传·序》[M]. 北京：中华书局，2009：1.

¹⁸ 陈思和《“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的创新尝试》[J].《当代作家评论》，2008（6）：90.

¹⁹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150.

免包含了对于武举考试形式的扭曲想象。而武举科考情节正是将民俗观念中的尚武精神和功名思想形象化和艺术化的巧妙结合。

再有，对旧小说中成功情节的因袭照搬。一个受到读者欢迎的情节往往会在另一些小说中反复出现。手法低劣者往往直接抄袭，只是将人物换个名字，而更高明的作者则是提取情节之中的精髓部分为我所用。连续的因袭甚至是抄袭，以及在因袭的基础上根据自身小说内容进行的改造，就将一个情节扩充成为一种情节模式。“武举”情节模式和其他情节模式一样，也可以大略从中寻出蛛丝马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作为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小说最优秀的先驱，对后世同类小说的典范意义不可忽视。段春旭先生认为：“一部好的小说一旦盛行于世，就会形成一个庞大的读者群，并形成一种固定的读者心理定势。”²⁰虽然没有确凿证据说明武举情节模式和“铜雀台比武”、“东郭校场比武”存在明确地因袭关系。但即使是同一类情节模式，每一部小说的具体情节也不会完全相同，一以贯之的是同类情节中蕴含的读者的心理期待，以及这种心理期待所反映出的某个社会群体的，甚至是整个民族的某种特质和精神。正如侯会先生所论的：“读小说可以识民心，观民气，借以了解一个民族思想情感的固有基础和发展脉络。”²¹借鉴前人的成功经验，照搬一个符合民众审美心理的情节体系，将一个延续着前人民心、民气和民族思想情感的模式拿来为我所用，正是古代小说创作者惯常使用的技法。

²⁰ 段春旭〈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续书〉[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2）：78.

²¹ 侯会〈试论明清小说与“柴氏公案”〉[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3，29（9）：17.

参考文献

-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 陈寿《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陈思和〈“历史-家族”民间叙事模式的创新尝试〉[J]. 《当代作家评论》, 2008(6).
- 杜佑《通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段春旭〈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续书〉[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05(2).
- 侯会〈试论明清小说与“柴氏公案”〉[J]. 《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2013, 29(9).
- 胡跃生〈从一个情节模式看叙事艺术的情节构成〉[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1997(10).
- 金丰《说岳全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罗贯中《三国演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施耐庵《水浒传》[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 司马光《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脱脱《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230.
- 吴敬梓《儒林外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张廷玉《明史·卷七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